

六十年來之蘇俄外交 (下)

畢英賢

大同盟時期 (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史達林最大的恐懼就是德國與日本同時進攻蘇俄。事實上，德國亦曾向日本作出此一建議^①，但是日本軍方却決定南侵^②，傲慢的希特勒亦不屑強求日本順從而單獨揮軍東進。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軍以三千多公里的廣陣面開始向蘇俄境內進攻。在此以前，德軍已把歐洲十四個國家，包括法國，攔到自己魔掌中。德軍的作戰計劃是，以強大的兵力由各方面向蘇俄進攻，期能在最短期間內迫使蘇俄停止抵抗或投降，把紅軍趕到烏拉爾山脈以東。這個計劃叫「巴巴羅沙作戰計劃」(Operation Barbarosa)，使蘇俄在防衛上頗感措手不及，也使布爾什維克政權面臨另一次生死存亡的鬥爭。

在整個德蘇戰爭中，蘇俄的主要外交目標是：(一)組織反希特勒同盟，(二)開闢第二戰場，(三)粉碎希特勒集團。爲了消滅希特勒主義，英國首相邱吉爾捐棄個人對布爾什維克的惡感，表示欲與蘇俄結盟；美國羅斯福總統亦聲明，將給予蘇俄一切援助。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英蘇達成「兩國對德作戰一致行動協議」，約定雙方不單獨與德國談判、停戰或簽訂和約，雙方相互提供各種援助。接着蘇俄與捷克及波蘭流亡政府恢復外交關係並締結軍事互助條約，與挪威及比利時等亦重建外交關係。於是，抗德大同盟開始形成。

在納粹坦克隆隆聲中，史達林向全蘇人民廣播說，蘇俄面臨嚴重危機；同時解釋當初因何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他說，「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不能拒絕與其鄰國簽結和平條約」的建議，況且蘇俄曾因此獲得一年半的和平^③。自然，他沒有招認，他對邱吉爾在德國進攻前數多次所作的警告置之不理^④。但是，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終於承認「我們的政府曾犯過很多錯誤」^⑤。後來

註① 「德國對外政策文獻：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D八」(華盛頓，一九六四年)，第六二頁。

註② 烏蘭(Adam B. Ulam)，「擴張與共存」(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第三三四頁。

註③ 史達林，「蘇聯偉大祖國戰爭」(O Velikoi Otechestvennoy Voine Sovetskogo Soyuzu)(一九五〇年第五版)，第一六頁。

註④ 邱吉爾，「大同盟」(The Grand Alliance)(波斯頓，一九五〇年)，第三五八——三六一頁。

註⑤ 史達林，「蘇聯偉大祖國戰爭」，第三五二頁。

，赫魯雪夫於一九五六年二月祕密講詞中，也把蘇俄於德軍攻擊前毫無準備歸咎於史達林忽視軍事情報與外交報告。

納粹軍事力量繼續深入，幾達列寧格勒及莫斯科的邊緣地區。蘇俄一方面依賴天然障礙——遼闊的地面與嚴冬的酷寒，一方面進行焦土政策，不留給敵人任何可用之物，以與德軍周旋。這是俄羅斯對付外來侵略的傳統戰略。納粹侵入之初，俄國的非俄羅斯人民視德軍為解放者，而德軍却以征服者自居，未能善用當地人民反共情緒。這是納粹侵俄失敗的原因之一。

當納粹繼續向蘇俄內部挺進之時，新形成的反德聯盟正設法建立軍事合作基礎。英國雖聲言給予蘇俄一切支援，但是力不從心；祇有美國在整個戰爭中，曾給予蘇俄價值一百二十億美元的援助與租借，各種物資大部分經由穆爾曼斯克、伊朗及海參崴輸入俄國。

德軍雖已佔領蘇俄的經濟與工業心臟地帶，但未達成預期的戰略目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於是蘇俄兩面作戰的威脅完全解除。史達林格勒生死之戰，終於在一九四三年二月結束，納粹軍隊失敗。同盟國士氣大振；整個局勢已被扭轉。然而，當軍事勝利在望之時，關於戰後問題之政治歧異，逐漸尖銳化。蘇俄謀取權力、優越地位與經濟利益的動機使處理戰後問題困難重重。史達林比邱吉爾或羅斯福更關心政治問題，對處理戰後問題也有其獨特的方案。一九四一年九月，蘇俄宣佈贊成「大西洋憲章」（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簽訂），該文件不僅是對德作戰的共同綱領，也規定了戰後「各民族都享有按照自願的方式安排自己事情的權利」等。在戰時，蘇俄尚信守諾言；戰後則完全兩樣，尤其在處理東歐各國政治問題時尤為明顯。

在德蘇戰爭中，蘇俄多次希望西方儘早開闢第二戰場；但不了解龐大軍事行動之補給與有關問題的困難程度，因此對英美遲遲未開闢第二戰場疑慮叢生^②。

在影響蘇俄與西方戰時關係的衆多政治問題中，波蘭問題最為突出。蘇俄與波蘭流亡政府間因疆界問題的歧見以及波蘭流亡政府根據德人供述要求調查大量波蘭軍官在俄國被屠殺的真相，致使蘇波在一九四三年之談判決裂。蘇俄因此組織「波蘭愛國者聯盟」，成爲後來波蘭傀儡政府的基礎。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其用意在於除西方國家對蘇俄戰後政策的疑慮。其實當時就有人了解「共產國際名亡實存，不過玩玩花招而已」。雖然如此，西方國家對此舉仍表示熱烈歡迎，對蘇俄的信心也因此增加。

爲了解決日益複雜的政治問題，史達林、邱吉爾與羅斯福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德黑蘭開會，討論主題包括聯合國之組成、蘇俄在遠東之利益、德國之前途、波蘭問題及蘇俄在東歐之目標。按照史達林的願望，戰後蘇俄將是歐洲唯一重要的軍事與政治力量。

一九四四年德軍已被逐出蘇俄領土，六月六日英、法、加拿大聯軍在法國登陸。蘇俄渴望已久的第二戰場終於開闢了，東戰場

註② 特魯汗諾夫斯基主編，「國際關係與蘇聯對外政策史」，第二卷第一三七頁；「大蘇聯百科全書」（一九五一年版），見「蘇聯對外政策」條。

也因之迅速進展。然而政治問題也愈益迫切，急須解決，於是史、邱、羅再度於二月四——十日在雅爾達開會。東歐與中國竟在這次會議上被出賣。會議重大決議包括：波蘭問題解決方案、德國無條件投降、蘇俄在遠東出兵條件。另有雅爾達密約，其中規定，保持外蒙現狀、庫頁島南部歸還蘇俄、大連港國際化、恢復俄人在中國東北之利益等，皆為當時史達林為蘇俄出兵遠東所索取之昂貴代價。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國無條件投降。七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柏林的波茨坦開會，討論並謀求解決有關德國、歐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問題；會中，美國仍特別關心蘇俄對日本作戰的問題^②。八月六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十四日蘇俄始對日本宣戰，兩天後，日本宣佈投降。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德國與日本被打敗了；英國與法國一蹶不振；蘇俄不僅佔領了全部東歐，而且還盤踞中國東北。

戰後史達林獨裁時期（一九四五——一九五三年）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國際形勢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這些變化表現於國際舞台上主要政治勢力的重新配置以及戰勝國家之間關係的更張。美國與蘇俄成為戰後國際政治中的兩大勢力，雙方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與國家基本利益的不同，以致在解決戰後世界問題上，發生了日益深刻的歧見。兩種對立的政策形成後，全世界便分成兩個對抗的陣營。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把歷時長久的美蘇對抗稱為「冷戰」。

冷戰發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最基本的不外：蘇俄與西方國家間互不信任；蘇俄一味為自身安全打算；蘇共視西方國家為敵人；以及蘇俄對外政策中的顯而易見的領土擴張主義。史達林個人對西方的仇視與不安全感也是東西冷戰形成的重要因素。史達林決意在東歐建立霸權，是冷戰的開端，特別是，蘇俄堅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一個「自由與獨立」的波蘭。史達林說：「……：這不僅是一個與榮譽有關的問題，而是蘇維埃國家本身的生死交關問題。」^③

蘇俄軍隊於第二次大戰末期，乘戰勝德國餘威，佔領東歐，把「人民民主」移植過來；然後，在蘇俄佔領軍與安全及警察部隊的庇護下，非共產的政治結構被破壞，非共產黨人被逐出政府機構。德黑蘭、雅爾達及波茨坦的安排，皆徒勞無功。在短短的三年內，東歐國家均已赤化，淪為克里姆林宮的附庸。

在西方國家的眼中，蘇俄勢力伸入東歐乃是它們國家安全的永恆威脅。

註② 同註①，第二卷第三二八——三二九頁。

註③ 伯恩斯（James Byrnes），「坦率之語」（Speaking Frankly）（紐約，一九四七年），第三二——三三頁。

在戰後諸問題中，德國前途問題是導致東西敵視的主要癥結之一。如果德國一旦成爲反蘇勢力，蘇俄在東歐的霸權地位就不能維持下去。起初，蘇俄欲對德國採取掠奪政策，以助蘇俄工業復興，並造成歐洲不穩定局勢。後來，覺得不妥而改變初衷。蘇俄外長莫洛托夫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巴黎外長會議上說，消滅或瓜分德國皆愚不可及，而應使它成爲一個民主與愛好和平的國家^②。九月，美國國務卿伯恩斯（J. Byrnes）作出相似的聲明。他說，德國是歐洲的一部分，如果德國變成貧民院，則歐洲復興的可能極微^③。不過，他要求把「東部領土」歸還德國。這片領土在尼賽河以東，原屬德國；波茨坦會議前，蘇俄片面劃歸波蘭，以補償被蘇俄奪取的波蘭東部領土。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美國杜魯門總統宣佈，美國政府將給予希臘與土耳其以軍經援助，其目的在協助希臘抵抗希共游擊隊，協助土耳其抵抗蘇俄的壓力。莫斯科立即指責杜魯門主義爲美國擴張的烟幕。接着，美國對歐洲提出較長期的援助方案，即馬歇爾計劃。蘇俄拒絕參與這個計劃，並且指責該計劃是企圖分裂歐洲成爲兩個集團，也就是把若干歐洲國家組成一個集團以對抗東歐與蘇俄的利益^④。

於是，蘇俄於同（一九四七）年九月成立了「共產黨情報局」，變更了共產運動的戰略；克里姆林宮恢復了資本主義威脅的宣傳，其政策聲明也強調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體系之間恆久的與不可調和的敵對性。蘇共更正式宣佈，美國是「帝國主義陣營」的推動力量，而帝國主義陣營的主要目標是強化帝國主義、策劃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打擊社會主義、支持各地反動勢力^⑤。這無疑是向西方正式宣佈「冷戰」。蘇共更令其黨徒在法國及義大利煽動罷工企圖破壞馬歇爾計劃。至於共產黨情報局的功能可概括爲：在意識形態上，要求東歐共黨絕對忠於莫斯科的路線；在組織上，促使東歐共黨團結一致以作爲控制東歐各國的工具；在政治上，明確地反對西方政策。至一九四七年底，史達林已取銷與非共產世界合作與容忍的路線，而一心一意鞏固東歐蘇維埃帝國。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政變成功，東歐完全被關入鐵幕，蘇俄對東歐的征服告成，蘇俄勢力似乎已統治從波羅的海至黑海間的廣大地區。但至同年六月，發生了兩件大事，一爲蘇俄封鎖西柏林，二爲蘇俄把南斯拉夫頭子狄托驅出共產黨情報局。事後檢討，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史達林的兩次重大誤算。

六月二十九日，蘇俄封鎖西柏林，其目的在（一）迫使西方退出西柏林，（二）阻止西德政府的成立，（三）西方任何讓步皆足以提高西方國家內共產黨的聲望，而有助於其顛覆活動。西方不惜代價對西柏林實施空運，使史達林陰謀未能得逞，這是蘇俄戰後在歐洲的首

註① 莫洛托夫，「德國的前途與對德和約」，載「對外政策問題：講詞與聲明」（莫斯科，一九四九年）（英語版），第六三一—六八頁。

註② 漢蒙得（Paul Y. Hammond），「冷戰歲月：一九四五年後美國對外政策」（紐約，一九六九年）第十五頁。

註③ 維辛斯基（Anatol Vysinsky），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在聯大的講詞。

註④ 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蘇俄對外政策與國際政治」，原載「國際形勢」（莫斯科，一九四七年）（英語版）。

次失敗。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西德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蘇俄遂於十月在東德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為報復。德國終被正式分裂。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共產黨情報局開除南斯拉夫共產黨；其理由是，該黨之「反黨」及「反蘇」觀點不符合馬列主義。這一事實打破了當時流傳的國際共產陣營團結一致與沒有矛盾的神話。雖然，狄托與史達林之間的爭執大部份起自權力之爭與個性問題，但對共產陣營的思想分歧有深刻的影響。史達林原想打擊狄托個人以助南國親蘇共產黨徒推翻狄托，並取而代之。然而，狄托的個人聲望與背景終使其屹立不動，這是史達林在共產陣營內首次遭受的重大挫折。

狄托事件後，蘇俄對東歐可能成為第二個狄托的人物皆一一加以整肅，如波蘭的戈默卡(Gomulka)，匈牙利的拉耶克(Rajk)，保加利亞的考斯托夫(Kostov)；同時，加強東歐的蘇維埃化。此舉使西歐頗感不安，因此成立軍事聯盟以抵制蘇俄的進一步擴張。

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北大西洋公約簽訂。蘇俄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資本主義侵略的軍事集團^②。同年發生兩件事，對蘇俄權力產生有利影響：一是蘇俄原子彈的試驗成功，一是中國大陸中共偽政權的成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國民政府曾被迫以雅爾達密約為基礎與蘇俄簽訂「中蘇友好聯盟條約」，蘇俄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願給予國民政府道義支持與軍事等援助。但是，蘇俄從未實踐其諾言；相反的，百般阻撓國民政府收復東北，並援助中共叛亂行動，導致偽政權的出現。

中國的赤化與東歐的蘇化使蘇俄的興趣轉向遠東；史達林希望，共產主義將在短期內橫掃全部亞洲。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對亞洲局勢也開始擔心。一九四九年年中期，美蘇軍隊撤離韓國，韓國以北緯三十八度為界一分為二；南北雙方皆欲消除對方，以自己的方式統一韓國。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軍隊進攻南韓，企圖以武力解決統一問題。西方專家皆認為，北韓南侵係由蘇俄幕後操縱，原預計這一行動將迅速獲得勝利；因此，美國的決心一拚，使蘇俄驚訝不已，中共亦因此介入戰爭。蘇俄在韓戰中的軍事目標，雖未達成，但曾從中獲得不少政治利益，例如，迫使西方把有限的軍事力量投入韓國戰場，以削弱西歐的防衛力，并加重其經濟負擔；使中共偽政權與西方之間的鴻溝加深，因而也使其對蘇俄的依賴程度加大。

一九五一年至五二年間，史達林繼續蘇化東歐，並透過「經濟互助委員會」及軍事條約試圖把東歐經濟與軍事完全置於蘇俄控制之下。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達林死亡，史達林時代告終。

赫魯雪夫時期（一九五三——一九六四年）

從史達林之死至赫魯雪夫被鬥下台，這一段時期內，蘇俄對東歐的控制漸趨穩定，國內軍事與經濟力量頗有成長；同時，國際

註①

同註②，第三卷第九八—九九頁。

權力的對比，發生變化，有利於共產世界，蘇俄的國際地位也漸漸上升。於是，蘇俄開始向開發中國家滲透並強調「和平共存」政策。匪俄爭執也在這一時期內發生與惡化。

史達林死前，顯然未曾安排其繼承人選。因此，在他死後，形成了暫時的「集體領導」；然而，不久大權終於集中於赫魯雪夫一身。在赫魯雪夫時代中，蘇俄對外政策的目標可概括為三點：(一)維持東歐蘇維埃帝國；(二)擴展蘇俄國際影響力；(三)維護其國際共產運動的領導權。

蘇俄新領導不久發覺，維持一個帝國比創立一個帝國難得多。一九五三年六月，東柏林首先發生暴動，蘇俄不得不以暴力予以鎮壓，其後兩年中，蘇俄爲了處理東歐集團內部問題，曾一度放鬆其對西方的冷戰；在韓戰問題上也一改其不妥協態度使停戰協定終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得以簽訂。同時對狄托開始和好，這表明蘇俄公開容忍「一條條大路通社會主義」的概念。一九五五年春，在奧地利問題上亦作讓步而獲得奧地利條約的簽訂，容許奧國在兩大集團間保持中立。此外，蘇俄放棄對土耳其的要求，改善與希臘的關係，解決與伊朗間的爭端，積極參加聯合國專業活動。於是，西方認爲可透過會議解決冷戰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終於召開美、蘇、英、法四國首腦會議。在會議上，赫魯雪夫同意謀求裁軍協議，並在一些次要問題上稍作讓步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但在重大問題上（如德國統一問題）決不妥協。另一方面，赫魯雪夫建議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組織（一九五五年五月成立）合併爲全歐安全體系。這種建議的誠意雖然可疑，但仍使西方覺得蘇俄也可理喻，因此同蘇俄的外交活動也較往日頻繁。

蘇俄的作風有了改變，但是其目標不變。九月，出售武器與埃及之舉暴露了蘇俄欲與西方在中東一較長短的圖謀。赫魯雪夫等訪問南亞諸國，也使蘇俄聲勢在此一地區大振。一九五六年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他提出「和平地區」這個口號^②。此外，他在討論蘇俄對外政策時提出了一些新觀念：(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雖然不可調解，但是兩個體系間的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向社會主義過渡可經由不同道路；(三)共產黨在民主國家中可經由和平的、議會方式奪取政權^③。四月，克里姆林宮宣佈解散「共產黨情報局」以支持赫魯雪夫的聲明。

在這次大會上，赫魯雪夫還作了秘密演說，開始了「貶史運動」。無論在內政或外交方面，這個運動皆影響深遠。一九五六年夏季，波蘭首先發生暴動；秋季，匈牙利掀起反共革命。關於後者，蘇俄斷然進行血腥鎮壓，西方國家與聯合國袖手旁觀，深恐干涉行動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正如阿倫（Raymond Aron）所說的「原子時代的不成文法」：「蘇聯可以在其勢力範圍內爲所欲爲，不虞報復」。匈牙利就是在蘇俄的勢力範圍內。雖然如此，蘇俄在這些事件中，亦已獲得了痛苦教訓：(一)東歐的控制必須以武力作後盾；(二)民族主義意識仍強烈；(三)權威一旦削弱，難以恢復；(四)爲維持東歐華沙公約國家的政治與軍事順服，必須容忍經濟與

註② 「新時代」，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第八期，附刊。

註③ 同前

文化的多樣性以及相當程度的獨立。無論在自由世界或共產世界，蘇共的名譽皆因匈牙利事件而遭受打擊。然而，自一九五六年東歐事件後，蘇俄仍舊視此一地區與其國家安全，關係極大，隨時準備以武力維護其霸權；但為形勢所逼，又不得不作出下列幾項重大修正：(一)對東歐民族主義作有限度的容忍；(二)經濟關係的調整，特別是一九六〇年以後，利用「經濟互助委員會」作為使東歐經濟一體化的工具；(三)容許東歐國家與西方國家發展經濟與文化關係。

在亞洲，蘇俄特別注意對中共的關係。一九五四年赫魯雪夫等訪問北平，簽訂了一些有利中共的協議。另一方面，中共因韓戰、中南半島戰爭、及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一九五五年四月）的表現，在國際上漸受注視。蘇俄貶史運動引起中共的異議，赫魯雪夫一九五六年新宣佈的外交取向，尤其是與美國和解政策，也為中共所反對。據說，在一九五七至六〇年間，蘇俄與西方的和解曾因中共的反對而緩慢其速度。及至中共實施「大躍進」（一九五八年），蘇俄又未能或不願給予其所需要的援助使中共懷恨在心。一九六〇年八月，蘇俄撤回在中國大陸工作的蘇俄技術人員與顧問，并且大量削減經援，使中共認為蘇俄故意阻撓其經濟發展。一九六一年，雙方爭執公開；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中共代表因蘇共批評阿爾巴尼亞共黨拂袖而去，並譴責蘇俄為「修正主義」，蘇共反擊，並指責中共為「教條主義」。

匪蘇之爭的實質在於世界共產運動的領導權之爭、共產運動的戰略之爭、兩個政權的目標與利益之爭。其中領導權之爭的意義，尤其重大。蘇共一向以共產世界領袖與代言人自居，毛澤東等在史達林死後妄想分享甚至獨佔世界共產運動領導權，因而導致雙方領導的相互仇視。

一九六三年七月，雙方在莫斯科舉行高層代表會議企圖解決歧見，但是仍然不歡而散。其後，蘇共一直試圖召開世界共黨代表大會以便與中共攤牌。一九六四年，蘇共已邀請二十個共黨於年底開會，匪蘇關係已面臨決裂邊緣。十月，赫魯雪夫突然下台，匪蘇緊張關係得以暫時緩和。

在歐洲，德國仍是東西方爭執的焦點。蘇俄一直擔心西德重建武裝；一九五四年九、十月間倫敦會議決議，規定西德重建武裝力量的範圍。十月底，巴黎會議協議，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約並獲准建軍。蘇俄認為西方的用心是把西德塑造造成「歐洲大陸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的打擊力量」^④。從一九五八年起，西德獲得飛彈與核子武器的可能性日漸增加。蘇俄覺得，美國的多邊核子部隊的建議就含有這個目的，因而劇烈反對。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金門炮戰過後不久，蘇俄突然挑起西柏林新危機。赫魯雪夫照會西方國家，要把西柏林改為「自由市」；如果在六個月內不能舉行協商，蘇俄將與東德簽訂和約並把西方前往西柏林的通道的管理權交給東德，但因西方立場堅定，未為所屈。一九六一年八月，東德突然築起柏林圍牆，使東西柏林在形體上分開，其目的固在阻止東德人民西逃，但是就赫魯雪夫本人而

註④ 特魯汗諾夫斯基主編「國際關係與蘇聯對外政策」，第三卷第二一五—二一六頁。

言，他對西方的警告無效後，必須有所行動以挽回其顏面。

柏林問題雖然仍舊懸而未決，但緊張情勢暫告緩和，直至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事件時，柏林情勢曾一度再告緊張。蘇俄在古巴飛彈問題上屈服，撤出業已開始裝設的飛彈，並於一九六三年簽訂核子禁試條約，使美蘇關係略有改善。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雪夫突然下台，蘇俄對外政策與外交活動面臨新的轉變。

布里茲涅夫時期（一九六四年起）

蘇共新領袖布里茲涅夫上台之初，專心整頓黨務與致力國內事務，而把外交事務交由政治局集體決定與處理。故就總的對外政策而言，沒有重大改變。對德問題所持立場未變；對中共祇在作風上有所改變，但本質不變，故中共譏之為「沒有赫魯雪夫的赫魯雪夫主義」。在這一段時間內，蘇俄試圖穩定歐洲局勢，向第三世界擴展其影響力，但又不得不面對越戰問題，而越戰問題卻使蘇俄對美國及對中共的政策更加複雜。在越戰問題上，如果對美國採取和緩態度，則有「出賣革命」之嫌，使中共的攻擊有了佐證；如果採取中共所期望的強硬態度，則有與美國正面衝突的危險。因此，蘇俄雖然給予北越物質援助，但是避不作進一步的介入，同時大談其「和平共存」政策，不斷絕與美國商談裁軍及其他問題的通渠。

中共問題雖然使蘇俄不安，但是蘇俄對外政策的主要對手還是美國。儘管雙方都認為核子戰爭為不可思議之事，軍力平衡問題依舊是兩國問題的中心點，蘇共新領導顯然沒有放棄在軍力上追上並且超過美國的政策。

在歐洲，蘇俄已於一九六二年解除對西柏林的壓力，並且標榜「不同社會體制國家和平共存」的政策，但在意識形態方面決不妥協。實際上，蘇俄對外政策目標在弱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分化西歐。越戰問題使西歐與美國意見分歧，法國戴高樂獨行其是的政策，亦有助蘇俄目標的達成。西歐集團雖然在對外政策上意見分歧，但經濟成長之速誠非東歐可與匹敵。

在東歐方面，若干各共黨政權獨立性漸增，並向西方尋求現代裝備與技術，不顧莫斯科的好惡，與西方國家建立貿易關係。在史達林時期，東歐政權與西歐共黨都是蘇俄執行政策的工具；至布里茲涅夫時代，蘇共已無法完全控制這兩股勢力。一九六八年，捷克發生民主化與自由化運動，蘇俄圖窮匕見，祇得進行軍事干涉，把杜布察克（A. Dubcek）拉下台來，重新建立親蘇的共黨政權，並在「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名義下，宣佈「有限主權論」。這說明了，蘇俄可以容許東歐國家一定程度的獨立，但決不容忍其政權變質。

在第三世界方面，布里茲涅夫追隨赫魯雪夫既定的政策，祇是此時局勢大變，要採取行動把西方勢力趕出亞、非、拉丁美洲，困難重重；更何況，中共的勢力已伸入第三世界，與蘇俄從事角逐。第二次「萬隆會議」因之流產。

在布里茲涅夫等掌權之初，中共曾停止攻擊蘇俄，希望新領導一改赫魯雪夫的政策。然而，不久雙方相互攻擊再起，和解無望。

，關係惡化。至一九六九年，兩度發生邊界武裝衝突。雙方透過外交途徑，才使緊張形勢緩和下來。就這一事實看，雙方皆不願挑起戰爭。戰爭危機雖被撲滅，但是問題並未解決。

自一九七〇年起，在執行對外政策上，布里茲涅夫變得較前活躍與突出。整個蘇俄外交也有了改變，最明顯的是蘇俄竭力改善同西方世界的關係。這個現象發生的基本原因在經濟。蘇俄爲了製造現代武器，其軍事費用不斷上升，終而影響其非軍事經濟各部門的繼續發展。在過去十數年間，由於多種因素，蘇俄的經濟成長率緩慢。如果軍事費用可以削減，那麼節省下的資源則可以用來促進經濟成長。此外，同西方工業國家改善政治關係，可以增進貿易、取得貸款，這些皆有助於解決蘇俄所面臨的經濟難題。除了貸款外，蘇俄經濟也需要西方先進技術。

蘇俄於一九七〇年決定在歐洲從事戰略性的和解^⑤。這導致蘇俄西德條約、波蘭西德條約、柏林協議等的簽訂，也導致歐洲安全會議的召開。這些條約的基礎是，承認現狀，包括現存聯盟體系、國界與國家。因此，歐洲問題已不是美蘇關係的焦點，世人視線於是轉向和解、限武談判、貿易、中東問題，以及南部與東部非洲問題。但是，蘇俄對歐洲（西歐與東歐）始終關心，毫不放鬆。目前，歐洲有三大傾向：「民族共產主義」、「芬蘭化」、「歐共主義」。民族共產主義產生在東歐。蘇俄使用「布里茲涅夫主義」加以鎮壓。「芬蘭化」是蘇俄試圖影響非共產國家內政與外交行爲的過程，其長程目標是不需用武而能統治歐洲。但是根據肯南所見，歐洲芬蘭化果真能成爲事實，將不是由於蘇俄的力量，而是由於西歐的衰弱^⑥。易言之，芬蘭化在歐洲不易實現。歐共主義係西班牙、義大利、法國等共產黨所持的特殊見解，它們不承認蘇共是共產運動的世界性領袖；它們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承認多黨政治及人權。歐共一旦獲得政權，對西歐政府固然是一種威脅，但是對蘇共的挑戰更爲嚴重。目前，蘇共無法約束歐共主義者。

一九七二年五月，尼克森訪問莫斯科，並達成多種協議，使美蘇關係大爲改善。這些協議表明，美國承認蘇俄的平等地位，這是俄國由來已久的目標。同時，美國也承認蘇俄在戰略上的均勢。自此，美蘇間最主要的問題乃是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其次是中東問題。歐洲的「和解」則因美蘇關係的改善而得鞏固。一九七四年，美國福特總統與布里茲涅夫曾在海參崴獲致了關於限武談判第二回合的協議。一九七七年，卡特總統一上任，就着手限武談判，但彼此立場相左，在最近期間內很難順利達成協議。

中東在蘇俄政策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殆無疑問。克里姆林宮會努力並不惜冒險在這一地區建立其影響力；蘇俄官方也不斷聲明，中東事務直接影響蘇俄安全。過去非洲在蘇俄的政策中不甚重要，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蘇俄似乎同意美國的看法，不把非洲

註⑤ 格瑞夫斯 (William E. Griffith)，「北京、莫斯科及其他」(Peking Moscow and Beyond) (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一九七三)，第二十五頁。
註⑥ 肯南，「俄人均是八呎高：西方未見其在威脅嗎？」原載 Freedom At Issue (「自由之爭」)，第三十七期(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月)，第十六頁；轉引：魯賓斯坦 (Alvin Z. Rubenstein)，「蘇聯之歐洲政策」，載「現代史」(Current History)，第七三卷第四三〇期(一九七七年十月)，第一〇七頁。

牽入冷戰。但近年來由於美國的主動與阿拉伯集團本身的政策，中東形勢有了轉變，蘇俄無法在此一地區有所進取，於是轉向非洲尋求補償。蘇俄加強非洲的活動尚有其他基本原因：(一)過去多年內，蘇俄大力增強軍事力量，以求達到與美國相同的戰略水平，成爲無遠弗及的強大勢力，中東、非洲、印度洋皆成爲蘇俄的目標地區；(二)尋求反資本主義陣營的盟友；(三)與中共在非洲一較長短^⑦。截至目前爲止，蘇俄在中東與非洲頗不順利，首先是埃及驅逐蘇俄顧問與軍事人員，廢除蘇埃友好條約；最近索馬利亞亦驅逐蘇俄顧問，關閉蘇俄軍事基地。前者使蘇俄在中東的戰略地位轉弱，後者使蘇俄海軍失去了在印度洋上的主要基地。雖然如此，蘇俄在非洲與中東絕不會輕易罷手。

在亞洲，毛澤東之死、四人幫被鬥均未有助於匪蘇關係的改善，所以目前這種「有節制的衝突」仍將維持一段時間。蘇俄亞洲政策的目標在：抵制中共影響力的擴張，逐漸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地位，最後建立蘇俄在亞洲的超級強國地位。爲了這個目的，蘇俄曾倡議而且仍在繼續努力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自一九七二年匪美接近以來，蘇俄與日本的關係未曾改善；而且，在短期內也無改善的可能。

一九七七年十月，蘇共公佈新「蘇聯憲法」，其中列有對外政策專章。新憲法一面強調，蘇俄一貫執行和平政策，但又清楚地說，蘇俄對外政策包涵有「鞏固世界社會主義地位，支持各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與社會進步之鬥爭^⑧」等宗旨。所謂「社會進步之鬥爭」即親蘇共產運動。此處，蘇共正式表明，不放棄世界共產運動。此外，蘇俄正式說明，蘇俄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在共產國家關係上，仍強調「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經濟一體化」、「國際社會主義勞動分工」等原則，可見蘇俄對共產集團的控制毫無放鬆的意向。

總的說來，布里茲涅夫在對外關係上非常謹慎，不作太多或太大的諾言，無意求取戲劇性的外交勝利以解決內部問題。他的外交總路線與赫魯雪夫無重大差異，但是作風不同。在他領導下，參加外交決策的人較多，因此外交的成敗不是由他個人單獨負責。

結語

蘇共已統治俄國六十年。在這六十年中，蘇俄的對外政策往往急遽轉變，可能從反資本主義國家路線轉而與其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從無產階級團結一致轉而組織人民陣線，從與民主國家合作轉而與法西斯國家合作，然後再回過頭來。竭盡翻雲覆雨之能事。但是，這些轉變中有一個共同常數，那就是：維護蘇俄的國家利益，實現世界革命。而這兩者中又有一個共同傾向，那就是蘇俄勢力的擴張。除非外力加以遏制，蘇俄的任何領袖均難與以往的史實，一刀兩斷，停止擴張而尋求世界安定。當然，如果俄國內政治制系與社會結構發生本質上的轉變，其對外政策與外交行爲或可隨之變化。不過，這種轉變在近期內很難發生。

註^⑦ 康貝爾(John Campbell)，「蘇聯的非洲與中東政策」，載「現代史」，第四三〇期，第一〇〇頁。
註^⑧ 「蘇聯憲法」(一九七七年十月)，第二十八條，載「真理報」，一九七七年十月八日。